

吉林中西部地区移民问题初探

李路华

[内容提要] 吉林中西部地区的移民活动历史悠久,最早可上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随着先秦时代的结束,当地的移民活动进入一个显著受区域性政权影响的新阶段。元明以降,移民浪潮稍有顿挫,清中叶以后,尤其是20世纪上半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移民风潮。区域与移民在发展中完成互相塑造的过程。

[关键词] 吉林中西部 移民 历史进程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5241 (2013) 06 - 0081 - 05

吉林中西部地区移民问题,是中国移民史与东北地方史研究中一个非常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问题。近年来,相关问题的讨论,进行得较为广泛,但是对其历史进程的梳理,尚有许多值得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吉林中西部地区的移民活动,始自旧石器时代晚期,历史久远,尤其值得关注的是20世纪初以来,这一地区经历了由清季而民国,由日伪而解放,由王公封疆而成移民乐土和由游牧区而成产粮基地等一系列巨大的时代和社会变迁。这一备受瞩目的历史进程,再次诠释了“谁为历史创造者”的命题。

石器时代的移民,揭开了吉林中西部地区历史发展的序幕。经过漫长的历史时期,至辽金时代。在辽金少数民族政权的影响和干预下,这一地区的移民及社会发展初现繁荣景象。20世纪80年代初期,吉林省的地质及考古部门,在位于吉林西北部的郭县查干湖东岸,发现距今13000年至7800年的古人类化石,即“青山头人”。青山头文化由旧石器时代晚期一直延续到新石器时代,甚至已进入到青铜时代。研究表明,青山头人是迁徙而来的,也是迄今为止在吉林省西部地区发现的最早的、延续时间最长的古人类。在吉林

中西部的其他县市区,也相继发现十余处新石器时代及更晚期的人类文化遗址,较有代表性的是位于前郭县的浩特芒遗址、西太平遗址等。这些文明程度更高的“现代人”来自何方?是由晚期智人“青山头人”进化繁育而来抑或是其他地区的“现代人”迁徙繁衍的结果?文献不足征,不能得其详。但是,现有研究表明,人口迁徙的历史同人类社会演进的历史同样悠久,吉林中西部地区概莫能外。上述遗址的文化类型,同辽宁“新乐文化”、内蒙古赤峰“红山文化”、黑龙江齐齐哈尔“昂昂溪文化”等,存在着诸多关联。这至少可以说明上述地区间的人口流动是存在的,吉林中西部地区人口的“移民说”,是可以成立的。

先秦时期,这些移民及其后裔,开始了与中原地区的政治和文化交往,这就是传世文献中肃慎人向中原的部族(虞、舜)、国家(西周),进献“楛矢石砮”的记载表明。这在中国移民及文化史上,有着重要意义。秦末直至宋初,吉林中西部地区先后是夫余、乌桓、鲜卑、勿吉、契丹、女真等族的活动范围,不同民族和部族间的人口迁徙比较频繁,这一地区的人口结构,受移民活动的影响,呈现出多民族杂居的多元化特征。辽金之际,东北(尤其是吉林中西部)的人口迁移活动“相当频繁”。北方汉人

[作者简介] 李路华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 吉林 长春 130033

[基金项目] 2013年吉林省社科院重点委托课题项目

(甚至统兵将领)基于逃避战乱、不堪暴政等考虑,迁入吉林中西部地区。除此之外,辽朝统治者还有意识地组织契丹人移民。如区内的长春州暨“春捺钵”所在地,即是契丹人的重要迁入地。金朝建立后,人口迁徙的势头有增无减,以至于出现汉族移民充斥各邑的现象。女真人也将大批契丹降人迁至当地,同女真、汉等族杂居,契丹人最终因此而融入他族。契丹族的消亡,是移民理论研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在吉林中西部地区,陆续发现了大量辽金时期的城镇遗址,这些古城及其出土文物,部分地呈现了辽金时期吉林中西部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所达到的水平,移民及社会文化首次出现繁荣景象。

元初,迄于明末,吉林中西部地区基本属于蒙古王公的势力范围和部族聚居区。期间前往东北的移民非但不多,而且“主要集中在辽东半岛一带”,吉林中西部地区人烟稀少,经济及社会文化重归于草莽,繁荣蛰伏。

二

清政权建立后,满蒙通过姻亲等途径结盟,包括吉林中西部地区在内的大片土地,被划为蒙古王公的领地和牧场,禁止他族擅入。清政府长期推行的“封禁政策”,对东北广大地区的移民及社会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形势变化,东北广阔且待开发的土地,对关内耕地面积不足的广大民众来说,具有越来越大的吸引力;加之“封禁”之既定政策在施行过程中时紧时松,很不严格,为移民活动的再次兴起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乾嘉之际,吉林中西部地区的移民活动有了一定的发展。吉林中部的扶余,在清代属吉林将军辖区,与蒙地接壤。该地的旗地、官庄较多。虽然有封禁政策的限制,但是由于旗人不善于经营管理等原因,上述地区渐而成为清代吉林地区移民较为集中的区域。嘉庆十五年(1810)时的统计数据表明,当时的新旧移民有万余户,若按每户5人计算,当有5万人。吉林中西部的大片土地,如前郭、长岭、乾安、长春、农安、德惠等市县,基本属于前郭尔罗斯蒙古王公的封地。前郭蒙地的拥有者,为筹款纾困,也以各种方式招揽大批汉民拓荒垦殖。较早见于记载的是乾隆五十六年(1791),前郭尔

罗斯族扎萨克恭格喇布坦招民私垦。

此后的几年间,不断有民户流入。嘉庆四年(1799)时,据清政府的报告,已查出前郭旗有流民2330户。此后,前郭旗王公又相继丈放今农安、德惠及长春周边的数十万垧蒙地。对此,清政府不得不承认既成事实,且为安定地方、消弭事端计,于嘉庆五年(1800)设立长春厅(光绪十四年升为府)。此后的十余年间,长春厅的移民屡禁屡查,而屡查屡增。嘉庆十一年(1806),长春厅又增加流民7千多人,两年后,查出新来流民3010户。到了嘉庆十六年(1811),登记在案的,有民户11781户、丁口61755人。即便如此,由于“封禁”一直被清政府奉为“基本国策”,因此雍乾此后的百余年间,吉林中西部地区的移民及土地开发,一直处于因“非法”、“违禁”而进程迟缓的状态。

19世纪中期以后,内忧外患接踵而至,一则以放荒筹款,一则以移民实边。在国人的一再吁请下,清政府不得不改弦更张,逐步开放东北荒地。咸丰十年(1860),开放哈尔滨以北的呼兰围场,次年,准许移民进入吉林西北草原,到了光绪三十年(1904),终于下令全部开禁。大批冀鲁民众出关北进,形成了日益高涨的移民浪潮。东北开禁后,大批关内百姓移民东北,男女老少络绎不绝,时人曾这样描述道:“由奉天入兴京,道上见夫拥只轮车者,妇女坐其上,有小孩哭者、眠者,兄从后推,弟自前挽,老媪拄杖,少妇相倚,踉跄道上……前后相望也。由奉天至吉林之日,逆旅所共寝食,皆山东移民。”

在这样的形势下,吉林中西部地区人口的激增。据1913年的统计资料,当时的扶余县已有包括汉、满、蒙等族在内的人口约35.5万人。而嘉庆十五年(1810)的人口数量只有5万人左右,相当于1913年人口数量的零头。要在百余年实现600%的增长目标,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显然是无能为力的。

劳动力的丰富,为当地的农业发展准备了必要的条件,伯都讷即后来的扶余县,成为吉林省乃至全中国的重要农垦区。再如吉林西部的长岭地区,此前草长莺飞,走兽麋集,难见炊烟。在清末放荒的大形势下,清政府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决定开放当地蒙荒30万垧,并于次年设长岭县。据日本外务省的统计数据,1913年前后,长岭已有

各族各类住户 1.6 万户,汉、满、蒙族人口 10 万余人。短短十年间,长岭的人文地理即因为移民的大批迁入而揭开了新篇章。宣统三年(1911),清政府制订了东三省移民实边章程,虽然未及施行,便爆发了辛亥革命,但其移民办法基本为民国政府所采纳。

三

20 世纪上半叶,是吉林中西部地区移民史上最为活跃的一个时期,同时也是当地移民文化最为丰富多彩的时期。吉林中西部地区适宜农牧业开发,尤其是在中国人均耕地普遍不足的情况下,有待开发的大量荒地对广大移民来说,无疑是巨大的诱惑。^①此外,政府的投入和扶植,铁路运输事业的发展等,为 20 世纪上半叶移民浪潮的到来,准备了必要的条件。以乾安县为例。1929 年,乾安设治不久,民国政府便对乾安县人口进行一次较为详细的普查,据统计,全县五区(本为六区,其中第 3 区无居民)共有居民 2462 户,17 693 人。^②二年后的又一次普查结果显示,全县六区 4735 户,38 812 人。^③两年间,增加 2273 户,21 119 人,按 10‰ 的自然增长率计算,两年自然增加人口约 360 人,很显然,其余 2 万余人是外来移民。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紧对东北地区的殖民掠夺,东北的移民及城市出现加速发展的局面。在此形势下,吉林中西部地区的人口有了显著增长。除去自然增长的因素,移民占了较大的比重。笔者查阅了相关档案,提取有关数据,经过分析,发现近十年间,上述地区移民的状况呈现以下特征。(见附表一、二、三)

第一,人口随着移民的不断迁入而一直处于增长的态势。特别是 1934-1936 的两年间,人口增加了 528 459 人,剔除 10‰ 左右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尚有约 25.5 万的人口净增长。这 25.5 万人,显然是外来移民。第二,1936-1942 年间,人口出现了负增长,人口流失超过了 27 万,这是当时国内国际形势影响的结果,同时也与区域间的人口迁徙有关。第三,在移民总量增长放缓的形势下,各县区出现了较显著的人口流动。特别是扶余人口的明显负增长,与前郭、乾安人口的显著增加之间,形成鲜明对比^④。第四,随着日本殖民政策的

不断强化,日本人、朝鲜人逐步渗透到吉林中西部地区。

随着移民的不断迁入,吉林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文化有了巨大进步,农工商并举^⑤,社会面貌多样。这对于当地的长期闭塞僻远而言,意义非凡。但直到新中国建立前,吉林中西部地区长期处于殖民统治和阶级压迫的状态之下。总之,进入 20 世纪后,吉林中西部地区移民史开始了一个新阶段,移民规模、移民类型以及移民文化等都有了不同以前的特征。而且由于大量调查统计资料的形成,为我们探讨该问题提供了相当的便利。

小 结

本文以区域特色鲜明的吉林中西部地区为中心,从冀鲁等地民众移垦关东、开发东北、并对区域的历史文化和经济社会留下鲜明烙印的视角入手,综合运用了考古发掘、史志文献、调查报告等信息来源,对这一地区的移民史进行了梳理和描述。这一地区的移民活动时代不同,形式各异,但基本上经历的是一个由自然而人文,由生计而生活^⑥,由自由而自觉的发展过程。当然,移民问题研究还包括背景分析、特征概括、影响评估等一系列问题。本文的写作仅是勉力而为,抛砖引玉而已。

吉林中西部地区的移民活动,最早可上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其间,洋溢着作为一种新生文化的青春气息。此后,从日渐活跃的移民活动中,我们发现一个了解边疆地域文化,理解中华悠久历史的渠道。随着先秦时代的结束,当地的移民活动进入一个显著受区域性政权影响的新阶段,即在辽金等统治者的影响下,以移民活动为媒介,中原与边徼、汉族同“异族”、华夏气度和松漠豪情之间,有了频繁而充分的交流。元明以降,移民浪潮稍有顿挫,但是却给清中叶以后的土地开发准备了优裕的自然条件。特别是 20 世纪上半叶,该地区随着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移民风潮,开始步入它的辉煌时期。

总之,自先秦以来,吉林中西部地区的移民活动及其文化,经过数千年的成长,遭遇过坎坷,也见证了辉煌,它的一系列品质和特征,经过岁月的不断打磨锤炼,而愈发突出。吉林中西部地区在塑造移民的过程中,也接受了移民的塑造。

附表一：1934 年末吉林中西部部分县市人口统计表

县别	本国人	日本人	朝鲜人	其他外国人	合计
长春	480 705(251 387;229 318)	27(19;8)	644(385;259)	2(2;0)	481 378(251 793;229 585)
怀德	311 368(164 788;146 580)	28(23;5)	2227(1372;855)	8(5;3)	313 631(166 188;147 443)
农安	294 436(156 334;138 102)	109(71;38)	151(94;57)	无	294 696(156 499;138 197)
德惠	234 266(119 276;114 990)	9(8;1)	49(26;23)	1(1;0)	234 325(119 311;115 014)
榆树	554 395(295 648;258 747)	15(13;2)	397(231;166)	无	554 807(295 892;258 915)
扶余	385 843(200 059;185 784)	90(53;37)	1026(582;444)	3(1;2)	386 962(200 695;186 267)
长岭	126 617(67 500;59 117)	19(13;6)	无	无	126 636(67 513;59 123)
乾安	51 882(28 078;23 804)	5(5;0)	无	无	51 887(28 083;23 804)
前郭	16 573(8406;8167)	无	无	无	16 573(8406;8167)
合计	2 456 085 (1 291 476;1 164 609)	302(205;97)	4494(2690;1804)	14(9;5)	2 460 895(1 294 380;1 166 515)

注：“本国人”，指伪满洲国成立后，在松原地区生活的中国人。“朝鲜人”，指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朝鲜半岛的朝鲜族人。“4 774 139(2 568 536;2 205 603)”，表示吉林省有 4 774 139 人，其中男 2 568 536 人，女 2 205 603 人。

数据来源：伪民政部：《满洲帝国民政部第一次统计年报》(康德二年刊行)，“2.全国户口数(康德元年 12 月末)”，吉林省社科院满铁资料馆藏，第 4-5 页。

附表二：1936 年吉林中西部部分县市人口统计表

县别	满洲国人	日本人	朝鲜人	其他外国人	合计
长春	496 402(265 890;230 512)	33941(18 773;15 168)	5128(3013;2115)	290(150;140)	535 761(287 826;247 935)
德惠	291 344(148 154;143 190)	480(285;195)	338(198;140)	82(48;34)	292 244(148 685;143 559)
农安	359 022(186 902;172 120)	204(123;81)	123(71;52)	1(0;1)	359 350(187 096;172 254)
怀德	365 249(194 084;171 165)	5243(2812;2431)	5861(3158;2703)	11(7;4)	376 364(20 0061;176 303)
榆树	598 392(315 711;282 681)	46(32;14)	537(300;237)	无	598 975(316 043;282 932)
扶余	542 130(282 164;259 966)	393(216;177)	1618(887;731)	26(13;13)	544 167(283 280;260 887)
长岭	157 117(82 399;74 718)	26(21;5)	328(184;144)	无	157 471(82 604;74 867)
乾安	65 614(30 662;34 952)	28(18;10)	无	无	65 642(30 680;34 962)
前郭	58 967(32 040;26 927)	210(145;65)	203(106;97)	无	59 380(32 291;27 089)
总计	2 934 237 (1 538 006;1 396 231)	40 571(22 425;18 146)	14 136(7917;6219)	410(218;192)	2 989 354 (1 568 566;1 420 788)

注：日本外务省所指的“满洲国人”，指伪满洲国成立前后的中国人。

数据来源：日外务省东亚局：《满洲国及中华民国在留本邦人及外国人人口统计表》(第 29 回，截止到昭和十年十二月末)，“第二表：满洲国人口省、特别市别”，吉林社科院满铁资料馆藏，第 3-4 页。另，伪国务院总务厅统计处：《康德三年末满洲帝国现住人口统计》(康德四年九月发行，吉林省社科院满铁资料馆藏，第 12-14 页)中的统计数据，与日本外务省东亚局的统计时间相近，统计数据有一些出入，可参见。

附表三：1942 年吉林中西部部分县市人口普查表

县别	满汉	蒙古族	回族	日本人	朝鲜人	其他外国人； 无国籍人	合计
长春	517 513 (264 441;253 072)	0	378 (209;169)	608 (465;143)	2378 (1219;1159)	4(4;0)	520 881 (266 338;254 543)
德惠	308 084 (154 647;153 437)	0	1219 (651;568)	904 (506;398)	1201 (620;581)	76(38;38)	311 484 (156 462;155 022)
农安	375 118 (192 900;182 218)	10(5;5)	434 (248;186)	396 (221;175)	184 (96;88)	无	376 142 (193 470;182 672)
公主岭	38 601 (21 873;16 728)	0	432 (239;193)	4845 (2673;2172)	1941 (1066;875)	无	45 819 (25 851;19 968)

榆树	613 655 (317 028;296 627)	0	870 (481;389)	210 (132;78)	2407 (1331;1076)	无	617 142 (318 972;298 170)
扶余	434 736 (223 887;210 849)	1702 (862;840)	3222 (1756;1466)	1161 (670;491)	3054 (1663;1391)	1(1;0); 25(13;12)	443 901 (228 852;215 049)
长岭	167 900 (88 239;79 661)(注 1)			40 (30;10)	131 (80;51)	无	168 071 (88 349;79 722)
乾安	90 386 (48 141;42 245)	151(92;59)	71(33;38)	117 (69;48)	7(3;4)	无;无	90 732 (48 338;42 394)
前郭	115 566 (61 194;54 372)	22 123 (11 904;10 219)	301 (157;144)	439 (278;161)	903 (477;426)	无;无	139 332 (74 010;65 322)
合计	2 661 559 (1 372 350;1289 209)	23 986 (12 863;11 123)	6927 (3774;3153)	8720 (5044;3676)	12 206 (6555;5651)	106 (56;50)	2 713 504 (1 400 642;1 312 862)

注 1:1941 年 7 月,长岭县划归“四平省”,随即将泰和镇村、太平山等划归开通县和长春县,又将辽源的太平川、保康村划归本县。(参考:长岭县志编委会:《长岭县志》,中华书局,1993 年,第 11 页)《满洲人口统计》(康德九年末)时,正值长岭县划区调整时,故而选择 1939 年的《满洲帝国现住人口统计》(康德六年)中的数据补足。

数据来源:[日]满铁调查资料科:《满洲人口统计》(康德九年末)、“民族别户口”(一、二),吉林省社科院满铁资料馆藏,第 6-12 页。

[注 释]

李西昆:《吉林省青山头人与前郭人的发现及其意义》,《吉林地质》1984 年 3 期。

佟冬主编:《中国东北史》(第 1 卷),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 年,第 9 页。

吉林省文物志编委会编:《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文物志》,1983 年内部资料,第 14 页。

葛剑雄等:《简明中国移民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23 页。

吴松弟:《中国移民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682 页。

参见清官修:《清仁宗实录》卷 164,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7 年;清长顺等:《吉林通志》卷 2“圣训志二”,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 年。

作新社编:《白山黑水录》,上海:作新社,1902 年,第 124-125 页。

日外务省通商局编纂:《北满洲》,启成社大正七年(1918)再版,吉林省社科院满铁资料馆藏,第 26 页,第 132 页。

《30 万垧蒙荒开放述略》,载长岭县史志资料办公室编《史志资料汇集》(2),内部资料 1987 年,第 33-35 页。

① 《东北各种土地利用统计表(1932 年)》、《东北各县区人口密度图》,见满铁经济调查会编《昭和九年满洲经济统计图表》,满洲日报社印刷所昭和 9 年,吉林省社科院满铁资料馆藏,第 21、22 页。1934 年日本实业部农务司,也做了一份农业统计资料。该统计资料,除将前郭地区的数据付诸阙如以外,长岭、乾安、扶余三地的统计数据,也与满铁统计略有区别。详见实业部农务司农产科《康德元年

满洲国农业统计》,“1. 土地利用统计, B 县别土地利用统计”,康德二年六月,吉林省社科院满铁资料馆藏,第 1 页。

② 吉林乾安县设治局:《乾安县户口统计表》(中华民国十八年九月),乾安县档案馆,案卷号 Z41。

③ 乾安县公安局:《为递填全县户口变动统计表》(民国二十年),乾安县档案馆全宗号 1,目录号 1,案卷号 1542,第 3 页。

④ 特别是前郭县,直至新中国建立前后,仍基本保持这样的人口规模。1948 年 11 月 20 日的一份调查统计显示,前郭共有蒙、汉等族人口 29 744 户,152 747 人。资料来源:《前郭旗人民政府办公室:前郭旗人民政府关于干部任免等档》(1948 年 4 月 10 日至 1948 年 12 月 1 日)之“郭前旗行政区划各民族户数人口分布及不能使牲畜统计表”,前郭县档案馆藏,全宗号 2,目录号 1,案卷顺序号 5,第 48 页。

⑤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一份人口调查资料显示,扶余、前郭等地,工商户及从业者均占一定比重,大致在 3-30% 之间。参见[日]山田胜夫:《昭和 10 年满洲农业统计》,“县别户数及人口”,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昭和 12 年,吉林省社科院满铁资料馆藏,第 352-353 页。

⑥ 据前文的三份人口调查(1934,1936,1942)可见,20 世纪 30 年代吉林中西部地区人口的男女比例大致在 108-109 比 100 之间,男女比例趋于合理。比起抛家撇业“雁行式”的移民形式,这种生活和生产方式的转变,对地区发展而言,意义重大。

责任编辑:刘毅